

## 江苏省东海县发现的打制石器

李炎贤 林一璞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葛治功 张祖方

(南京博物院) (南京地质陈列馆)

### 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 1978 年 9 月在江苏省东海县山左口公社大贤庄附近发现的石制品。

石制品主要以石英岩砾石为原料。全部标本均采自大贤庄附近的山坡地表。采集品中有：石核(单台面、双台面、多台面及船底形石核)、石片、石锤、砍砸器(包括用石片制成或用石核制成者,单向加工或交互加工)、刮削器(单刃与双刃)、圆头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加工较为简陋,大部分为一般的特点,在进一步确定时代上意义较小,唯船底形石核较有意义。这批标本虽然脱了层,但在调查中未见到陶片或磨光石器,推测其时代有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稍晚。

1974 年夏,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刘泽纯、潘瑞鸿等在新沂县和东海县交界处作地貌考察时,于大贤庄一带的路上捡到几块人工打过的石块,1977 年秋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有关同志鉴定,确定这是有意义的发现。这一发现,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1978 年夏,在江苏省文化局周郁同志的指导下,组成一个调查小组<sup>1)</sup>。从 9 月 2 日到 10 日,在大贤庄南边的山岗及冲沟附近,采集了一批石制品。现将这次调查的结果报导如下:

### 一、大贤庄附近地质地貌概况

大贤庄位于东海县西北角的山左口公社的西南方约 4 公里,离县城约 31 公里,西边紧靠着马陵山,与山东省的郯城县交界,处于鲁中南低山丘陵区的南部边缘(图 1)。马陵山为南北向的低山,在大贤庄附近山顶海拔 90 米。山体为白垩纪紫红色砂岩,泥岩等组成。大贤庄附近基岩裸露较多,山坡冲沟发育,多呈“V”形,切割可达 10 米之深。在大贤庄南及官庄西,有由砂砾石层组成的河流二级阶地,分布在海拔 55—60 米左右,由于受后期的侵蚀作用,形成孤立状。

这片砂砾石层主要由粗、中砂及卵石组成,卵石约占 50%—60%,主要为脉石英、石英砂岩和燧石等,占 90% 以上,其它有少量火成岩、片麻岩及紫色砂岩。一般磨圆度较好。砾石以 1×3 及 3×5 厘米者为主,占 70% 以上,大者直径超过 13 厘米。砂砾石层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江苏工作的林一璞,南京博物院葛治功、郭礼典,南京地质陈列馆张祖方及东海县图书馆许贤武等。

东海县大贤庄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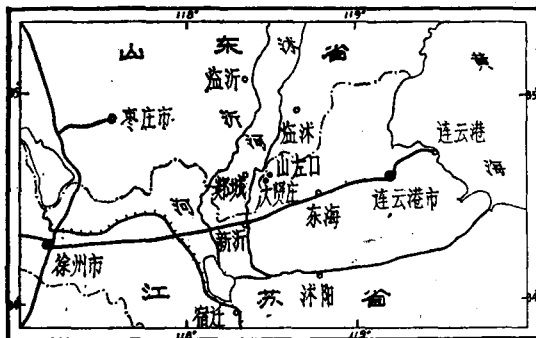


图 1 东海县大贤庄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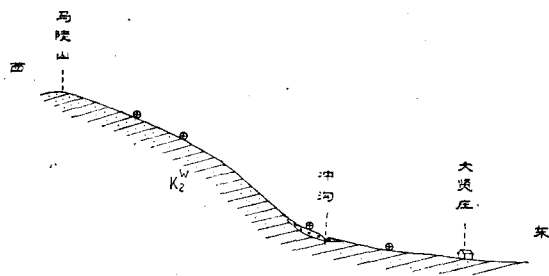


图 2 大贤庄石器地点剖面示意图

的厚度在山脚下的最深约 1 米,在庄南岗地上的最深为 1.8 米。

这次采集的石制品,从山顶附近至山脚附近均有,主要采自砾石层附近的冲沟上(图 2)。

## 二、石制品的观察

采集的石制品约 200 件左右,其中一部分人工痕迹较少,仅有一、二处有打击痕迹,在分类、确定文化性质和技术特点等方面的意义较少,另有一部分标本受现代人的影响太大,这两部分标本在研究时经反复考虑,决定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取其剩下 86 件标本作为本文观察的主要依据。

制造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石英岩,其次为石英,较少的为燧石,砂岩、角砾化石英岩、火成岩。这些标本多少保留砾石面,说明系取自附近的砾石层。岩石的成分也与附近砾石层中的成分相同。石制品的棱角有一部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磨,但也有较为新鲜的。

石核 共 27 件,其中单台面石核 10 件,双台面石核 10 件,多台面石核 6 件,船底形石核 1 件。

单台面石核,大部分标本保留或多或少的砾石面。最小的标本为  $34 \times 72 \times 46$  毫米,最大的标本可达  $55 \times 145 \times 119$  毫米。大多数标本系采用扁平的砾石向一面打片。台面为砾石面者 3 件;一部分为砾石面,另一部分为人工打制者一件;台面为人工打制者 6

件,其中一件由两块石片疤构成,二件台面有人工打击的小疤。台面的利用情况有 4 种:

(1) 在台面的一侧或一边打片,计有 5 件。简单地打下一块石片或打下数块石片(往往较小),石片疤形状多不规则,宽大于长或长大于宽者均有,最大者可达  $53 \times 93$  毫米。台面角最小者为  $60^\circ$ ,最大者可达  $100^\circ$ ,以  $70^\circ-80^\circ$  者为多。

(2) 在台面的相邻两边打片,计有两件。经打片后台面的加工部分呈不规则的凸边。标本的两面均保留砾石面。石片疤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台面角在  $70^\circ-80^\circ$  左右。

(3) 在台面的相对两边打片,仅一件。一侧经多次打片,石片疤重迭,多短而宽,另一侧保留有较大的石片疤 ( $43 \times 66$  毫米),台面角为  $65^\circ$ 。

(4) 在台面周边打片,计两件。其一(780010)台面由两块大石片疤构成,台面角由  $73^\circ-94^\circ$  均有,石片疤形状有较为窄长的,也有较为宽短的。另一件(780169)周边可以看到较为窄长的石片疤,但可以看出打击点的石片疤均较碎小,台面角在  $85^\circ-90^\circ$  左右。前一标本近似锥状,后一标本呈锥状(图版 I, 1;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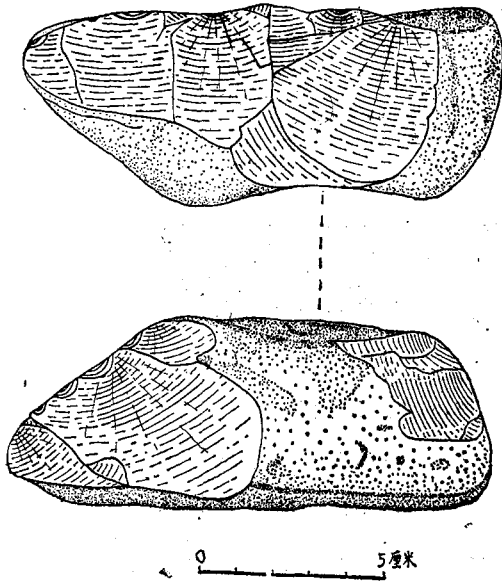


图 4 双台面石核

在它的的一个台面上似有修理痕迹,由这一台面打下的石片疤均较小,形状不规则,台面角在  $85^\circ-93^\circ$  左右;另一台面打下的石片疤亦较小,台面角在  $90^\circ$  左右。

(2) 两台面相对,不在同一侧打片,打片方向相错。这样的标本有 3 件,其一(780290)呈板块状,左右两侧各打下一块石片,石片疤近似梯形,台面角一为  $55^\circ$ ,另一为  $60^\circ$ (图版 I, 3);另一件(780061)形似粗大的扁尖状器,两边错向打片,石片疤有较大者( $52 \times 47$  毫米),台面角为  $60^\circ-80^\circ$ (图 4);最大的一件(780089)主要在一个台面打片,台面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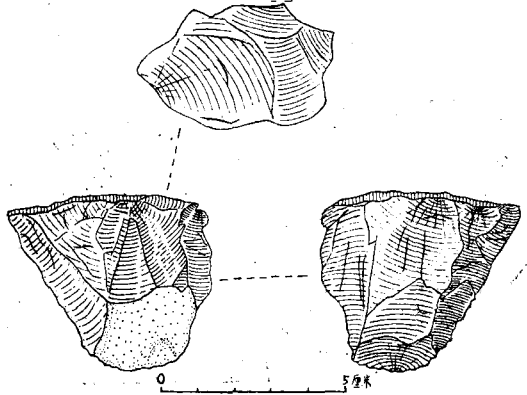


图 3 单台面石核

双台面石核 大小不等,最小者  $31 \times 54 \times 46$  毫米,最大者  $70 \times 135 \times 110$  毫米。除一件标本可能为石块制作者外,其余标本或多或少保留砾石面。台面均由砾石面或石皮构成者 5 件,均由石片疤构成者 4 件,一台面由砾石面构成而另一台面由石片疤构成者仅一件。台面的利用情况可分为 4 种:

(1) 两台面相对,在同一侧打片,打片的方向相对。这种情况以一件标本为代表,

60°左右,另一台面只打下一块近似梯形的石片疤,台面角为85°。

(3) 两台面直角相交者4件。由两个台面打下的石片疤都不很大,其尾端相连或遥相对应,台面角较大,由75°—95°左右,以80°—90°者居多(图5)。

(4) 向相邻两台面相交处打片,此两台面均为人工打制,计两件。其一主要在一台面打片,石片疤较小,多窄长,台面角70°—85°左右,另一台面打片方向垂直于前一台面的打片方向;另一件标本连续向两面打片,近似交互打法,石片疤碎小,台面角在85°—9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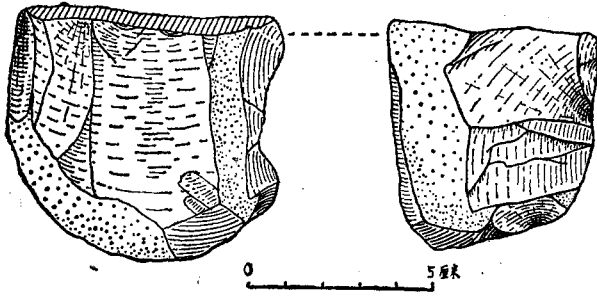


图5 双台面石核

多台面石核 球状或似球状者3件,较大者直径在100毫米左右,较小者直径在70毫米左右,石片疤多较小,台面角多在

90°左右。近似长方体者一件,49 × 72 × 52毫米,台面角在80°左右,石片疤较小,较大的有呈三角形者(图版I, 2)。此外还有一件多台面石核,一端厚大,一端薄锐,类似砍砸器;有一件多台面石核系由扁平的砾石的两侧边向两面打片,台面角近于垂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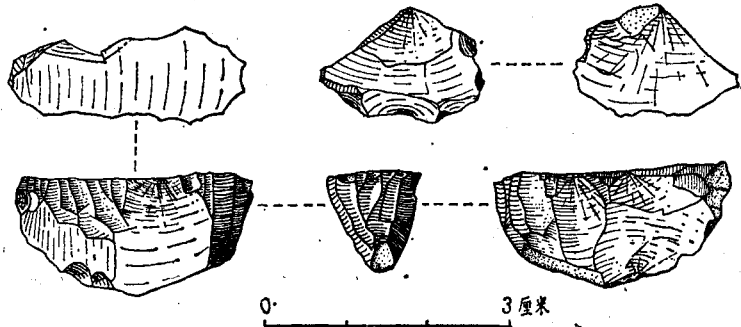


图6 左及下为船底形石核,右上为刮削器

船底形石核 仅一件,13.6 × 28 × 11.5毫米。顶平而长,底窄锐呈龙骨状。一端较小,似为台面,一面似为破裂面。另一端似为石片的远端,由平顶向窄底连续打下窄长的细石叶,台面角为64°—74°。平顶的两侧边都有向窄底剥落碎片的痕迹。窄底部分也有向平顶剥片的痕迹(图版II, 3及图6左及下)。

这一石核近似山西沁水县下川地区发现的船底形石核(安志敏, 1978)或宽型楔状石核(王建等, 1978)。

石片 共44件。约有四分之三的标本保留或多或少的砾石面或石皮。最小的标本为30 × 26 × 10毫米,最大的为113 × 81 × 45.5毫米。长以3—5毫米左右者为多,宽以3—6毫米左右者为多,厚以10—20毫米左右者为多。形状多不规则,偶有呈梯形或三角形者。台面由砾石面或石皮构成者有19件,其中8件在背缘或一侧有打击痕迹;人工台面25件,其中有疤的10件,有脊的3件。台面有较为宽厚的,也有相当薄小的。打击

点多不集中,半锥体凸起者不多,有 3 件标本在打击点附近显著凹陷(图版 II, 1 及 3), 类似贵州水城硝灰洞的“锐稜砸击石片”上的特点(曹泽田, 1978)。双锥体的标本亦有几件(图版 II, 2)。多数标本的背面有石片疤。石片角从  $85^{\circ}$  到  $130^{\circ}$  左右均有,以  $95^{\circ}$ — $125^{\circ}$  左右者为多。约近一半的石片或多或少有第二步加工痕迹。

**石锤** 原为一略为扁平的砾石,一端较窄向两面剥落石片,台面角  $65^{\circ}$  左右,另一端较宽向一面多层剥落碎小的石片,台面角  $65^{\circ}$ — $90^{\circ}$ 。较宽一端剥落的石片疤可能是这块砾石当作石锤使用所致,而较窄的一端则可能是当作石核打片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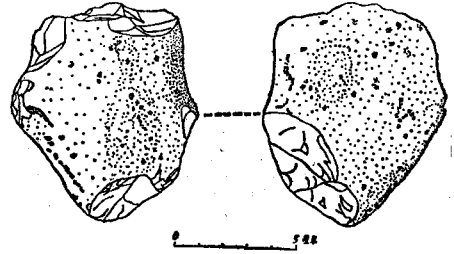


图 7 石锤

**砍砸器** 共 4 件,石片制成者 2 件,石核制成者 2 件。用石片制成者其一向破裂面加工成凸刃,刃角  $68^{\circ}$ — $75^{\circ}$ ,刃缘凹凸不平(图 8),另一件标本主要向背面加工成凸刃,刃角  $63^{\circ}$ — $88^{\circ}$ ,右侧边较陡,左侧边较为平缓(图 9)。石核砍砸器之一轮廓近似矩形,断面近似平行四边形。标本的四边均有打片痕迹,两边单面加工,另两边交互加工,刃角  $82^{\circ}$ — $90^{\circ}$  左右(图 10)。另一件标本的轮廓似尖状器,一侧向一面打片,台面角  $97^{\circ}$ ,另一侧交互打击成曲折的刃缘(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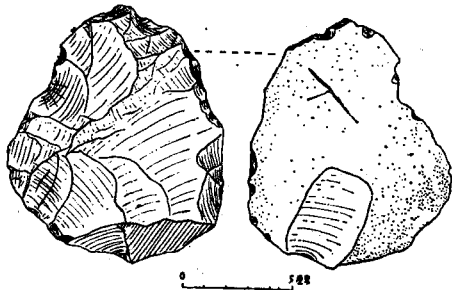


图 8 砍砸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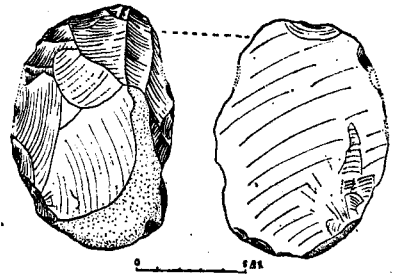


图 9 砍砸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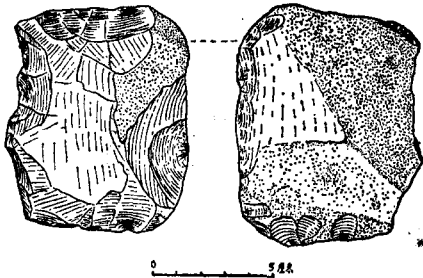


图 10 砍砸器



图 11 砍砸器

**刮削器** 计 8 件,以石片或断片制成,最小的为  $13 \times 19 \times 5$  毫米,最大的为  $35 \times 77 \times 23$  毫米。依加工或使用情形,可分为:

(1) 单凸刃刮削器 共 3 件,向背面加工者 2 件,其一在远端加工成横刃(图 6 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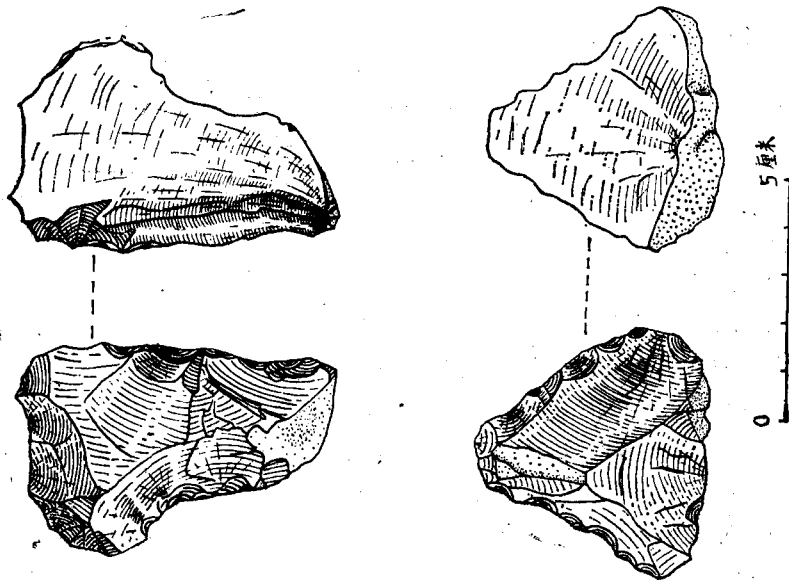


图 13 上为圆头刮削器 下为尖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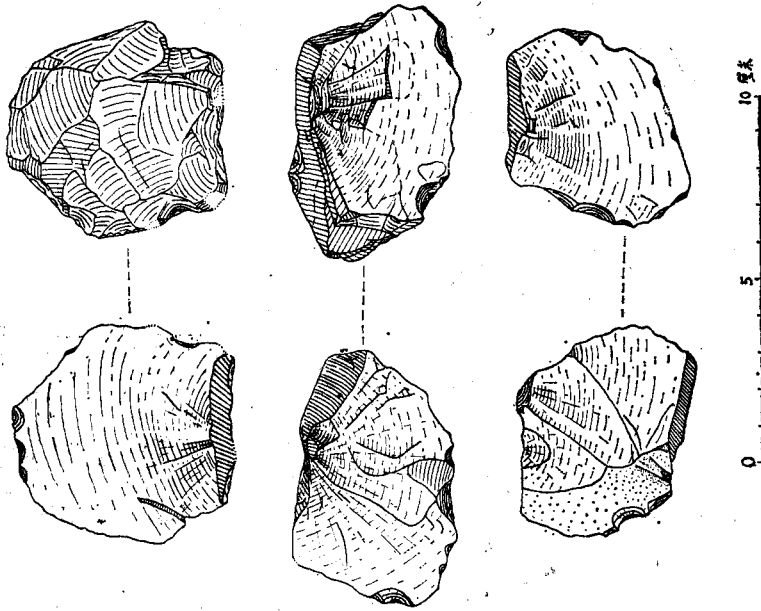


图 12 刮削器

上),另一在两侧边及前端,连成凸刃(图 12 上);还有一件标本则分段向两面加工,近似错向(图 12 中)。

(2) 双刃刮削器 5 件。其一在台面有加工使用痕迹。这 5 件标本的加工方向不尽相同,两刃均向背面加工而成者 3 件,一边向背面,另一边错向加工而成者一件。还有一件两边加工方向相错(图 12 下),刃缘两边为直刃者 2 件;一边凹,另一边凸者 3 件。刮削器的刃角通常较大,小于  $70^\circ$  者较少,一般都在  $70^\circ-85^\circ$  左右。

圆头刮削器 仅一件(图 13 上)。62 × 42 × 22.5 毫米。天然台面,台面及部分背面保留砾石面,右侧似作为台面向左侧打片、加工集中于左侧边和远端,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于左上角汇成一圆形突出的厚刃,左侧加工成凹刃,刃角  $69^\circ-77^\circ$ ,前端微凹,刃角  $59^\circ-77^\circ$ ,左上角刃角  $68^\circ-87^\circ$ 。

尖状器 也只有一件(图版 II, 4 及图 13 下),43 × 50 × 25 毫米。台面和背面的前端保留砾石面,石片角  $114^\circ$ ,两侧边向背面加工,于远端汇成一平钝的尖。两侧刃缘均不平整,左侧刃角  $80^\circ-83^\circ$ ,右侧刃角  $75^\circ-80^\circ$ ,两侧边的夹角约为  $55^\circ$ 。

### 三、讨论和结论

大贤庄发现的石制品,从分布范围看来,有的接近山顶,大部分在山坡上。两者的高差 20 多米。这不同高度发现的石制品是属于一个时代还是不同的时代,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这批石制品有确切的层位关系和伴出的动物化石,讨论它的时代就较为容易一些,目前的情况是较为困难的。若山顶附近发现的标本和山坡发现的标本均出自同一发展系列的不同的阶地堆积物,则山顶发现者可能较山坡发现者为早;遗憾的是这批石制品都没有确切层位关系,所以这一论点缺乏事实支持。如果把山顶和山坡发现的石制品看作是上、下层的关系,认为山坡上发现者早于山顶上发现者,同样缺乏地层上的证据,也是难于接受的。在我们看来,同一山头相距不太远的地表发现的石制品可能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当然并不排斥有时代较晚的东西混在一起的可能。

这批石制品包括几种因素:

(1) 大部分石核、石片和石器具有古朴、简陋的特点,其中一些标本可以和华北或华南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制品比较,也可以和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标本比较,这类延续时间过长的石制品当作确定时代的“标准化石”是不适宜的;

(2) 船底形石核过去在北方发现一些,近年来发现地点增多,且有若干具地层关系,并作了绝对年代的测定。这种石核的时代大致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可能延续至新石器时代。在考虑时代问题时,值得提出的是调查期间并未见到陶片或磨制石器。

从类型和制作技术看来,这批石制品包括的时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但有可能要晚一些。

东海大贤庄发现的石制品是有一定意义的,(1) 船底形石核的存在,对认识这类石制品的发展和分布范围增加了新的资料;(2) 这批石制品的发现情况给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在东海地区进行调查,解决地层关系问题的任务,通过这一工作有可能在江苏找到更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同时也有可能为确定马陵山的第四纪堆积物的时代提供有价值的

资料。

本文插图为作者自绘,照片为王纯德同志摄制,特此致谢。

(1979年1月20日收稿)

### 参 考 文 献

- 王建等, 1978: 下川文化。《考古学报》1978(3), 259—288。  
 李炎贤、文本亨, 1978: 贵州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古人类论文集》, 77—90。  
 邱中郎、李炎贤, 1978: 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论文集》, 101—120。  
 安志敏, 1978: 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考古学报》1978(3)289—316。  
 贾兰坡, 1978: 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2), 137—143。  
 盖培、卫奇, 1977: 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5(4), 287—300。  
 曹泽田, 1978: 贵州水城硝灰洞旧石器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6(1), 67—72。

## ON A COLLECTION OF CHIPPED STONE ARTIFACTS FROM DONGHAI, JIANGSU

Li Yan-xian Lin Yi-pu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Ge Zhi-gong

(*Nanjing Museum*)

Zhang Zu-fang

(*Nanjing Museum of Ge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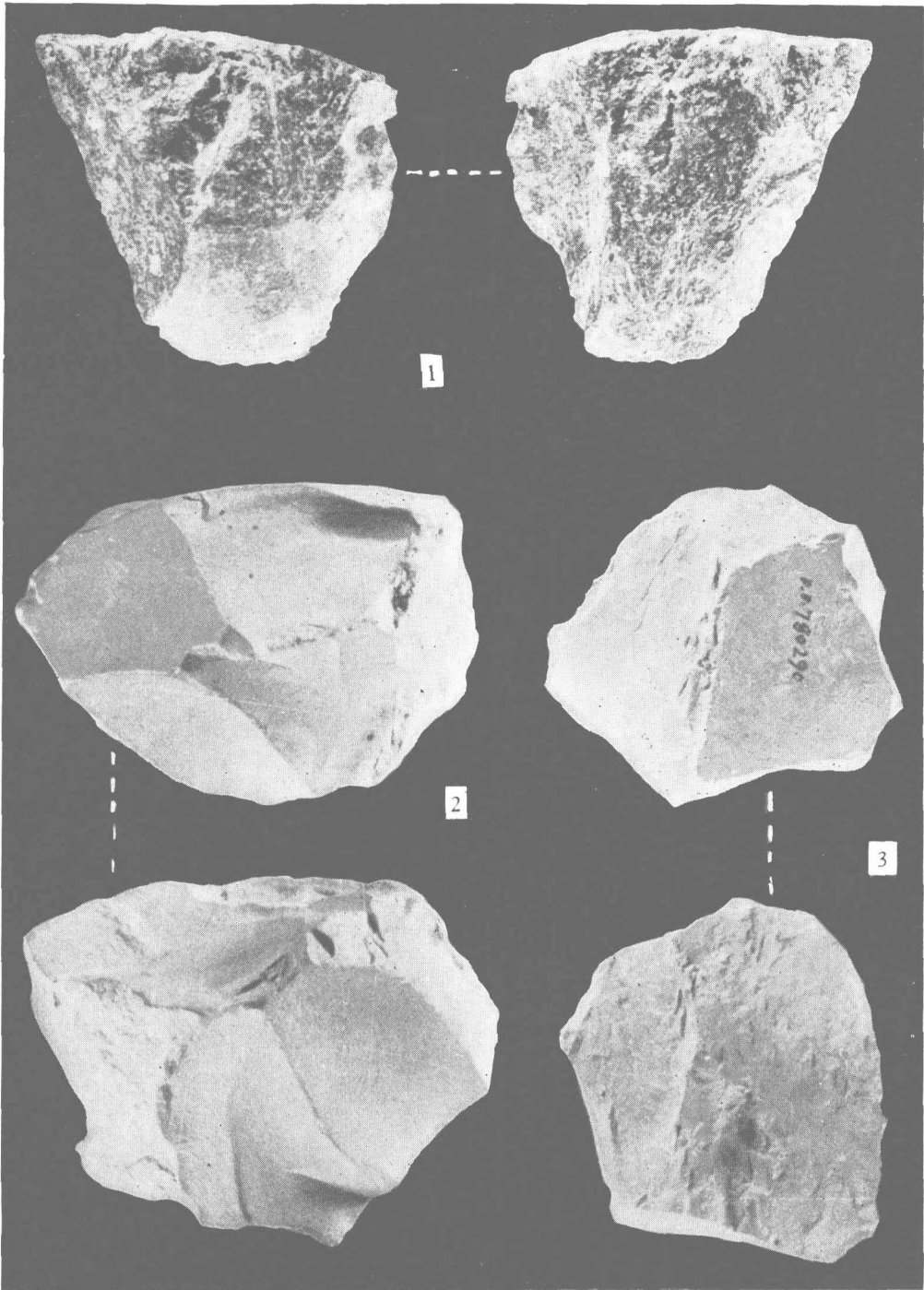
###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deals with a collection of chipped stone artifacts from Daxianzhuang, Donghai, Jiangsu in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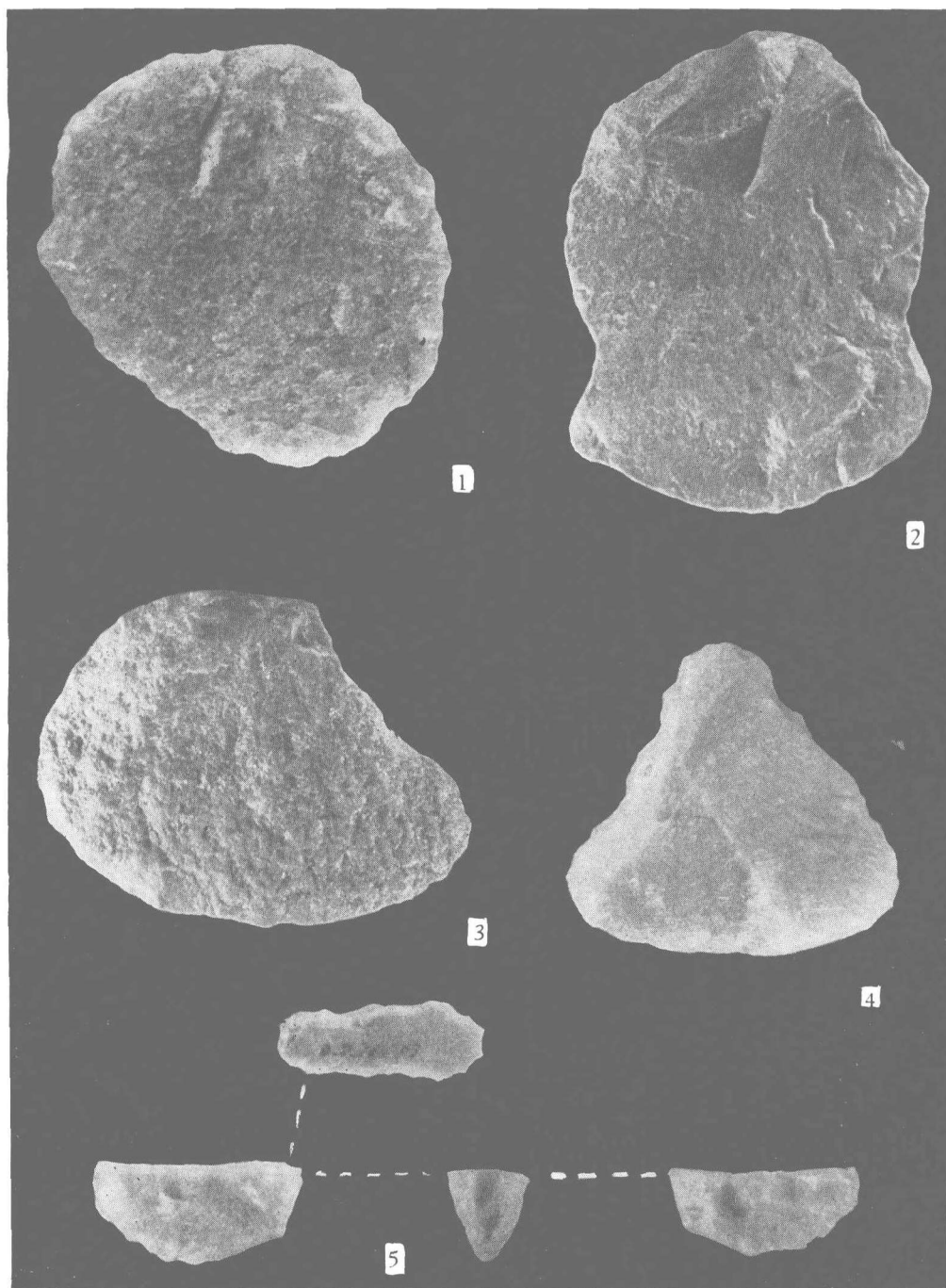
All the specimens lie scatter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hill slope near Daxianzhuang. They are chiefly made of quartzite pebbles. Among the finds 27 nuclei, 44 flakes, 1 hammerstone, 2 choppers, 2 chopping-tools, 8 scrapers, 1 round scraper and 1 point are recognized.

We find difficulty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age of the stone artifacts, lacking the evidence of stratigraphy and paleontology. However, not a single piece of potsherd nor a polished stone tool was encountered in the course of investigation, though we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look for. Typologically, most of stone artifacts are of common nature hard to date exactly. In addition, a piece of boat-shaped core seems to be more interesting. As a whole, the age of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Donghai may be provisionally regarded as late Palaeolithic or later.





1.单台面石核 2.多台面石核 3.双台面石核  
均为原大



1、2、3 为石片 4 为尖状器 5 为船底形石核  
1、2、5×1， 3× $\frac{3}{4}$ ， 4 接近原大。